

日本近現代的汉语教育史回顧

吴 丽君

Japan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Review

WU LIJUN

要旨

近現代とは、日本における明治維新以降から第二次世界大戦敗戦までの歴史的な期間（1868-1945）を指す。1937年日本の中国への侵略は、戦前と戦時を分ける境界線である。明治時代、日本は西洋に学び、西洋化が進んだが、中国語の学習は廃止しなかった。明治維新以降、日本は西洋へ向け開港し、来日する中国商人の数も増加した。商人、学者および留学生達が日本に集い、中国語や中国の文化を伝える積極的役割を果たした。

明治時代における中国語教育は、日本の中国に対する侵略拡大の背景と切り離すことはできない。中国語の呼称は「唐語」から「清語」に代わり、最後に「支那語」に統一された。この時期、中国語教育の内容も変化し、文言文から口語体の白話方言に変わった。中国語専門学校が多数設立され、多くの専門的に中国語を教える教師が出現し、中国語のテキストも多数出版された。明治維新以降、第二次世界大戦終結までに日本の近現代中国語教育の基本的な体制が整ったといえる。

【キーワード】 汉语教育 明治维新 近现代 口语体 教科书

一. 明治维新后至日本侵华战争前 (1868—1930)

自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而与此同时,日本进入明治时期(1868—1912)。1867年的明治维新是日本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折点,也是日本近代文明的开端,日本积极学习西方,全盘西化。“文明开化”政策的提出和全面贯彻执行,是日本长期以来兴盛兰学、洋学和科技文明的必然结果,其目标是学习和赶超欧美等西方文明大国,以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取代封建的观念和旧习俗,从而使日本尽快走上现代化道路。而“文明开化”的中心内容是推动近代启蒙运动和兴办近代教育。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的汉语教育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但是始终没有中断。新政府废除了唐通事制度,同时,汉语也不再称作“唐话”,一度叫“清语”,后日本出于军事方面的需要,又统称为“支那语”。

这一时期前期教授的是南京话,属于南京语教育,可以说是江户时代教育的延续。之后,转为北京官话教育时期,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中国语教育的开始¹⁾。

1) 官办汉语学校

从1868年明治元年开始,日本进入了近代。1871年,日本与中国缔结了“日清友好条约”。当年,为了培养翻译人才,日本外务省设立了中国语学校——汉语学所。虽然废止了唐通事制度,但是,这所学校的汉语老师都是唐通事出身,所教授的也均是南京官话。教材有《汉语跬步》、《二才子》、《闹里闹》、《译家必备》等手抄本教材。这是一所最早教授中国语的正规学校,隶属于外务省管辖,可见其出于外交需要的目的,这是实用中国语教育的开端。1873年,汉语学所归为文部省管辖,后来合并进了东京外国语学校(称旧外国语学校),成为该校的汉语科。在这期间有一个问题出现,日本政府主要希

¹⁾ 六角恒广,《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P.77-78。

望与北京的清政府打交道,而汉语学所教的是南京官话²⁾,为此,从1876年(明治9年)9月开始,日本的汉语教育由讲授南京官话转变为北京官话教育,这是由于外交的实用需要而进行的改变。为教授北京官话,日本驻中国公使馆还专门从中国聘请了汉语教师。首任教师为最擅长北京官话的旗人薛乃良,所使用的教材为英国驻北京公使威妥玛(Sir 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6)编的《语言自迩集》³⁾。这是一本1876年出版的问答体的教科书。1885年,东京外国语学校(旧外语学校)废止。汉语与俄语、汉语一起并入了东京商业学校,后改为东京高等商业学校。1897年,这一学校附设有英、德、法、清、韩各语种的外国语学校。两年后即1899年这些外语学科独立出来成为东京外国语学校,这是东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为与之前的东京外国语学校相区别,称之为新外国语学校。

2) 民办汉语学校

除了官办的汉语学校之外,还有一些民间私塾性的学校。最主要的有三所:日清社、兴亚会支那语学校、日清贸易研究所。

最早建立民办学校的是日本人广部精(1854-1909)。广部精,号鹿山,著名汉学家,受其父亲影响,深为亚洲的未来忧虑,提倡“日清亲和”,属于“兴

²⁾ 南京官话指以南京语音为基础的中国官方标准语。南京官话曾经长期是中国的官方语言。五胡乱华、衣冠南渡以后,中原雅音南移,作为中国官方语言的官话逐渐分为南北两支。明朝灭元,定都南京,“壹以中原雅音为正”,即以南京音为基础音系,南京官话为国家标准语音。由于江南较少受少数民族迁入影响,加之六朝以来南人文化上的优越意识,明代以及清代中叶之前中国的官方标准语以南京官话为主流。周边国家所传授、使用的中国语也是如此。明清时期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所流行的中国话,基本上是以南京官话为标准,直到民国初年西方传教士主持的“华语正音会”,也以南京音为标准。清末编审国语及民国确定新国音以后,北京官话成为中国官方的标准语。六朝时期中国传入日本的语音主要是金陵雅音(又称吴音)。从江户时代到明治初年,日本官立学校和民间私塾所教的中国语都是南京话,直至明治九年(1876年)日本官方才转而使用北京话。

³⁾ 【英】威妥玛著《语言自迩集》(第二版)1886年出版,在当时是一部权威性的北京话课本。它系统地记录了19世纪中期的北京官话音系。作为课本,语音、汉字、语汇、阅读并重,1500多条注释提供了丰富的语言及社会文化背景知识,价值远远超出其作为课本本身,目前已成为西方汉语教育史研究的重要文献。

亚”派。1876年（明治9年）在东京创办汉语私塾“日清社”，教授汉语，但以教授南京官话为主。在日清社教授汉语的除了广部精本人以外，还有王治本、松本万年、二口美久等人。同时，他还创办了《日清新志》、《寰海新报》等汉文杂志。1877年日清社关闭，广部精随后到东京外国语学校学习北京官话。他参考威妥玛的《语言自述集》，编辑出版了日本明治时期最早的北京官话教科书《亚细亚言语集支那官话部》（七卷七册）、《总译亚细亚言语集》（四卷五册）。日清社虽然只存在短短10个月，但是意义重大，特别是广部精所编写的汉语教科书在当时以及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1880年（明治13年），民办“兴亚会支那语学校”在东京成立。创办人是军人曾根俊虎，他曾到中国做过实地考察。这所学校共接受了145名学生，其中，军人占了绝大部分，由此可见，办学的初衷有军事方面的考虑。这所学校两年后关闭。

善邻书院是中日甲午战争后建立的民办汉语学校，创办人是宫岛大八（1867-1943），他是日本近代著名的汉语教育家。曾到中国留学七年，精通汉语汉文化。他回国后于1895年创立汉语学校“咏归舍”，1898年（明治31年）改称善邻书院。善邻书院的教学对象是社会人员，宫岛还自编了汉语教科书《官话急就篇》（后有详述）。宫岛以儒教思想作为善邻书院的教育精神讲授汉学和中国语，宫岛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精通汉语，他所聘请的教师也都具有较高的汉语水平，因此，善邻书院在当时影响很大。“这个善邻书院办得很好，外语学校的支那语学科，好似善邻书院的支店。”⁴⁾善邻书院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时才停办，四十年间共培养了一千多名学生。

进入19世纪80年代后，还有一个与之前不同的情况出现，之前的中国语教育都是在日本国内进行，而在此时，为了更快速地培养汉语人才，也到中国设立汉语学校，从日本募集学生来中国学习。1884年（明治17年），日本人在上海创建了东洋学馆，不过存在时间极短，代之以亚细亚学馆，维持的时间也不长。1900年创建南京同文书院，后迁至上海，改称东亚同文书院。1890年，

⁴⁾ 田中庆太郎，《日本帝国文部省第25年报》，第68页。

同为军人出身的荒尾精在上海创办了一所汉语学校——“日清贸易研究所”。名义上培养日中商贸的人才，而实际上是培养从事情报工作的特务人员。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第一批毕业生几乎全部从军从事翻译谍报等工作。

这一时期的汉语教育反映出日本对外扩张主义的倾向，是在为今后向中国扩张做充分的准备，与之前的汉语学校有很大区别。由此，我们看到，前期日本政府创办汉语学校是出于外交、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需要，而新的形势下，一些私塾汉语学校的创办更多的是出于政治、军事上的考虑。

3) 中国语及北京官话的教材

《语言自述集》是英国驻北京公使威妥玛（Sir 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6）在任外交秘书官时所编。初版于1876年，再版于1886年，1903年出版第三版。是教西洋人学北京官话口语的问答体教科书。1886年版的《语言自述集》（第二版），在当时是一部权威性的北京话课本。它系统地记录了19世纪中期的北京官话音系。作为课本，语音、汉字、语汇、阅读并重，1500多条注释提供了丰富的语言文化背景知识。也是一部用威妥玛式拼音（Wade system）记录十九世纪北京话的资料集。《语言自述集》全书共有8章，其中以“散语”、“问答”、“谈论”三章最为重要。形式上采用一问一答的会话方式，主要内容包括北京官场上的应酬、宴会及访问时的谈话、主仆之间的对话等不同场面，生活场景生动、语言使用贴近生活。这部书在日本也受到极大的欢迎。

1879年出版的日本明治时期最早的北京官话教科书《亚细亚言语集支那官话部》（七卷七册）、《总译亚细亚言语集》（四卷五册），是广部精以《语言自述集》为底本，加进了日本人所熟悉的内容编写的，在日本国内广泛流传，逐渐代替了《语言自述集》。

1880年出版了福岛九成编写的《参订汉语问答篇国字解》，主要是将《语言自述集》加上了译注。1886年陆军军官福岛安正依据《语言自述集》编写了《自述集平仄编四声联珠》，是一部独特的问答体教科书。

这一时期，还有一部高级会话课本《官话指南》⁵⁾，是吴启太和郑永邦合编的。他们继承的是唐通事唐话的传统，而与《语言自述集》关系并不大。内

容上反映的是当时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场景，被誉为“支那语”时代的经典之作，这是日本人最早独立编写的汉语教科书。

1904年，由善邻书院出版了宫岛大八编辑的《官话急就篇》，1933年改名为《急就篇》。编者宫岛曾于1887至1894年在中国生活并学习汉语，他是以自己所经历的生活为基础来编写的，语言生动、贴切，符合当时北京话的特点。在日本汉语教育界，《官话急就篇》被誉为二战前日本汉语教科书的“经典”，“这本教科书可以说是战前中国语教育的象征，从出版到这次战争结束，再版了170多次。”⁶⁾此外，宫岛大八还编写了《急就篇总译》、《罗马字急就篇》、《急就篇发音》、《续急就篇》，另有《日华字典》、《时文类纂》、《支那官话字典》、《支那语会话篇》等。中田敬义（1879）把日语的《伊苏普寓言》（《伊索寓言》）译成北京官话，使其同样成为明治时期较早的一本汉语教科书。御幡雅文（1890）的汉语课本代表作是《华语跬步》，另外还编写了《沪语便商》、《沪语便商意解》、《沪语津梁》、《官商须知文案启蒙》、《生意集话》、《台湾土语读本》等。

《官话指南》、《燕京妇语》都是为日本人在北京工作生活所用的汉语教材。《官话指南》（日驻北京公使馆翻译吴启太、郑永邦合编，1881年刊行）共分四卷：第一卷“应对须知”，是关于询问姓名、年龄、工作，以及看望病人等方面的对话；第二卷“官商吐属”，是关于拜年、做生意、狩猎、劝朋友戒毒等方面的对话；第三卷“使令通话”，是吩咐仆人或其他人工作或办事等用的话语；第四卷“官话问答”，是大臣出访时接受酒席招待使用的话语，还有外国领事到中国政府机关调和商船冲突使用的话语等。《燕京妇语》是一本日本驻北京的侨民女眷学习北京话用的会话课本。教材分上下两卷，共22课。课文内容反映的是北京当时中上层社会的生活，有中外妇人之间的会话，有妇人和男士们的会话，有妇人和下人们的会话，有妇人和商人们的会话等。谈话的话题主要有初次见面、邻居相遇、探亲、访友、游览、拜年、接风、送行、宴

⁵⁾《官话指南》是日本驻北京公使馆翻译吴启太，郑永邦合编的汉语读本，与1881年刊行。是为在北京工作的日本人所用的汉语教科书。

⁶⁾安藤彦太郎著，卞立强译，《中国语与近代日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P.32

请、祝寿、裁衣、种花、租房、打首饰等。

另外，当时的琉球国⁷⁾由于与中国福建等沿海地区的贸易往来频繁，汉语教育也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些汉语教材，其中，比较著名的是《百姓官话》⁸⁾，由清人白瑞临于乾隆十四年（1749）编写而成，是一部当时琉球人学习汉语的高级课本，影响很大。

二.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1931—1845）

这段历史虽然只有8年，但因其特殊性，有必要单独加以阐述分析。

日本政府很久以前就开始把中国语教育定位在“商务”和“军事”两个方面，到战前一段时期内，更是把军事目的作为重点，具体到把将来到大陆作战的陆军士官的培养作为重点。1879年，参谋总部派遣旧外国语学校毕业生来中国学习汉语。1881年创办的陆军士官学校也开设中国语课程。前面谈到的“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创办者荒尾精本人即是现役的陆军军官。日清贸易研究所得到了参谋总部的资助，毕业生中的大多数人在战争中都充当了翻译官。

1931年（昭和六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在那里炮制了伪“满洲国⁹⁾”。日本政府派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军队称为“关东军”，1934年，关东军参谋部出版了《速成满洲语自修书》等实用性教材，冠以“满洲语”、“满洲口语”之类的书名也乘机出现了，所谓“满洲语”就是中国语。从“唐话”到“清语”，再到“支那语”和“满洲语”，从对待中国语称呼的改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政府对待中国态度的变化。

⁷⁾ 琉球国，最初是指历史上在琉球群岛建立的山南（又称南山）、中山、山北（又称北山）三个国家的对外统称，后来指统一的琉球国（1429年至1879年）。琉球国的地理位置在台湾和日本之间，曾经向中国的明、清两代和日本的萨摩藩、江户幕府朝贡。琉球国多次遭受日本的入侵，1609年，萨摩藩入侵并在一个时期内控制琉球国北部，此时的琉球国仍然对中国朝贡。琉球国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东北亚和东南亚贸易的中转站著称，贸易发达，号称“万国津梁”。1879年3月30日，日本兼并琉球王朝，琉球国灭亡。大部份国土改设为冲绳县，北部诸岛则划入鹿儿岛县。

⁸⁾ 《百姓官话》是山东登州府莱阳县商人白瑞临遭遇风暴漂到琉球后汇纂的，成书于乾隆十四年到十八年（1749~1753）之间。

上述提到过的宫岛大八编的《官话急就篇》，在1933年也改版为《急就篇》发行，内容上也作了调整，删除了有关清朝的“状元”、“进士”之类的词语，在“问答之上”、“问答之下”部分里增减了一些内容，如将“兵船”改为“军舰”，“初几了”改为“几号了”。这部改订版的教科书成了日本人学习汉语的必读书，具有广泛的读者群，既有日本国内的人使用，也有在殖民地“满洲国”的日本人学习。据统计，此书“自昭和8年（1933年）10月出了改订初版以来，已发行两万部”¹⁰⁾。为巩固统治，日本政府派遣了大批的日本人进入中国东北地区。为这些长期生活在中国的日本移民考虑，创办了一些汉语学校，编写了一批教材，如，《实用中国语》、《铁道会话》、《速效满洲语说法》、《参观旅游用语》等之类的会话教材。

1937年，“卢沟桥事变”¹¹⁾后，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在“圣战”的旗号下，驱赶大批日本青年参战，这时的中国语又出现了所谓“大兵中国语”。还出现了不少为普通士兵编写的如《简明军用中国语》、《日支会话速记》、《日满会话》之类的速成汉语读物。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教材种类繁多，涉及的行业也很多，甚至也有农业方面的汉语教材。另外，除了会话课本外，还出现了一些语法书、教学

⁹⁾ “满洲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利用前清废帝爱新觉罗溥仪在东北建立的一个傀儡政权，通过这一傀儡政权，日本在中国东北实行了14年之久的殖民统治，使东北同胞饱受了亡国奴的痛苦滋味。此傀儡政权的“领土”包括现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全境、内蒙古东部及河北北部。当时的中国南京国民政府不承认这一政权。当时国际上以日本为首的法西斯等国家或政府承认伪满洲国，国际联盟主张中国东北地区仍是中国的一部份，中国政府从未承认这一分裂中国领土恶劣行径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以新京（长春）为首都，前清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为伪满洲国的国家元首，官方语言为“日语”。

¹⁰⁾ 六角恒广著，王顺洪译，《日本中国语教学书志》，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年，P.138。

¹¹⁾ “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占领中国，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从1937年6月起，驻丰台的日军连续举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并诡称有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搜查。1937年7月7日驻华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抗日战争爆发。

参考书和词典。在这一时期,成就突出的是仓石武四郎先生。关于他个人的成就下文将做全面介绍,在此只侧重介绍他的教材编写。仓石武四郎共编写了8种,有《支那语发音篇》(弘文堂1938年出版)、《支那语语法篇》(弘文堂1938年出版)、《支那语读本》(卷一、卷二)(弘文堂1938、1939年出版)、《支那语翻译篇》(卷一、卷二)(弘文堂1938年1940年出版)、《仓石中等支那语》(卷一至卷五)(1939年至1941年弘文堂陆续出版)等。特别是《仓石中等支那语》,是高级汉语教材,内容有蔡元培、叶绍钧、鲁迅等现代作家的作品,他的贡献在于“将现代中国文学作品引进了教科书,使停留于实用语的中国语学习的教育,转变到文化语言学的教学上来¹²⁾”。

在日本国内,中国语学习月刊有《支那语》、《支那语与时文》、《支那语杂志》等三种。汉语教育就是在这种扭曲的现实背景下发展,似乎形成了一个新高潮,直至日本战败。战败后,所谓“支那语”的教育顿时寂静下来。

三. 结语

日本汉学家六角恒广指出:“明治以后近代日本的汉语教育以昭和20年(1945年)为分界线,其前后存在着巨大的差异¹³⁾。”前者是以会话实用为目标,后者则是以学习中国文化为目的。

综观日本近现代将近80年的汉语教育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汉语教育是紧紧伴随着日本政府扩张的政治需要的,我们从“支那语”“兴亚学院”“东亚同文会”等一系列的名称上便可看出端倪,这也决定了教育的性质和特点。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汉语教育也确实得到了普及,学习的人数也是空前的。

1945年日本战败,近现代的汉语教育宣告结束,此后开启了当代汉语教育时期。

¹²⁾ 六角恒广著,王顺洪译,《日本中国语教学书志》,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年, P.164

¹³⁾ 六角恒广,《中国語教育史論考》,不二出版,1989年

【参考文献】

著作：

- 1) 六角恒广著，王顺洪译，《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
- 2) 安藤彦太郎著，卞立强译，《中国语与近代日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 3) 大庭脩著，徐世虹译，《江户时代日中秘话》，中华书局，1997
- 4) 六角恒广著，王顺洪译，《日本中国语教学书志》，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2000
- 5) 董明，《古代汉语汉字对外传播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
- 6) 六角恒广著，王顺洪译，《日本近代汉语名师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7) 六角恒广，《中国語教育史稿拾遺》，不二出版，2002
- 8) 六角恒广，《中国語教育史論考》，不二出版，1989
- 9) 六角恒广，《近代日本の中国語教育》，不二出版，1984
- 10) 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
- 11) 张亚军，《对外汉语教学法》，现代出版社，1990
- 12) 严绍璁，《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 13) 王桂，《中日教育关系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
- 14) 仓石武四郎，《中国語五十年》，岩波书店，1973
- 15) 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2000
- 16) 张西平等，《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调查》（上下），中国大百科出版社，2003
- 17) 李向玉 张西平 赵永新，《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澳门理工学院，2005
- 18) 董明，《古代汉语汉字对外传播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
- 19) 石锋，《汉语研究在海外》，北语出版社，1995
- 20) 李泰洙，《〈老乞大〉四种版本语言研究》，语文出版社，2003
- 21) 牛岛德次，《日本汉语语法研究史》，甄岳刚译，北语出版社，1993
- 22) 大河内康宪，《日本近、现代汉语研究论文选》，北语出版社，1993
- 23) 鱒泽彰夫，《燕京妇语·解说》，日本好文出版社，1992
- 24) 六角恒广，《中国语教本类集成·第一集第二卷》[日本] 不二出版，1991
- 25) 六角恒广，《中国语教本类集成补集：江户时代唐话篇》[日本] 不二出版，1998
- 26)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 27) 吕叔湘，《近代汉语指代词》，学林出版社，1985

28) 江蓝生,《近代汉语探源》,商务印书馆,2000

论文:

- 1) 王澧华,日编汉语读本《官话指南》的取材与编排,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6(5)
- 2) 张美兰,陈思羽,清末明初北京口语中的话题标记,世界汉语教学,2006(2)
- 3) 张美兰,掌握汉语的金钥匙——论明清时期国外汉语教材的特点,《国际汉学》第12辑 2005.4
- 4) 张西平,明清时期的汉语教学概况,《世界汉语教学》,2002.1
- 5) 胡书经,法国汉语教学和研究的歷史,《语言教学与研究》,1983.2
- 6) 张卫东,论19世纪中外文化交往中的汉语教学,北京大学学报,2000.4
- 7) 董明,青史留名的古代对外汉语教师,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2.4
- 8) 白乐桑,法国汉语教学史浅论,中国文化研究,1993.2
- 9) 崔颂人,美国汉语教学的先驱——戈鲲化,《世界汉语教学》,1994.3
- 10) 李真,《汉语札记》对世界汉语教学史的贡献,《世界汉语教学》,2004
- 11) 郭作飞,《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简评,《世界汉语教学》,2005.4
- 12) 张美兰,明末清初北京口语中的话题标记——以100年前几部对外汉语教材为例,《世界汉语教学》,2006.2
- 13) 江蓝生,《燕京妇语》所反映的清末北京话特色,《语言研究》,1994.4